

# 王韬与郑观应交往论略

——兼及王韬对郑观应思想之影响

萧永宏

**内容提要** 王韬和郑观应的交往主要围绕着郑观应《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的出版和修订而展开,此外,在格致书院考课命题、会见孙中山并帮助其上书李鸿章、会见康有为、为解决王韬生计求助盛宣怀等活动中,郑、王二人均多有往来。他们之间的交往,主要以王韬对郑观应思想的影响为主脉。王韬的《易言》跋,推动了《易言》的更新和《盛世危言》的问世,是郑观应救时自强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指南和推手。

**关键词** 王韬 郑观应 《易言》跋 《盛世危言》 《弢园文录外编》

萧永宏,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210097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6.05.032

王韬与郑观应同为晚清著名的思想家,自光绪初元开始往来,迄光绪二十三年王韬辞世,交往长达二十余年。除却日常礼节性的往来外,思想的交流和影响始终是其主脉。由于1880年代中叶以前,王韬在思想舆论界声名显赫,占据先着,因此,就二人思想的交流和影响而言,又主要以王韬对郑观应思想的影响居多,事实亦大体如此。今就所见申论一二,疏漏不周之处,幸识者进而教之。

王韬和郑观应的交往主要围绕着郑观应的几本重要著作的次第出版而展开。二人初次交往大约在光绪元年<sup>[1]</sup>(1875),时郑观应慕王韬之名,将已出版的《救时揭要》和部分成书的《易言》书稿<sup>[2]</sup>“从七千里外邮筒寄示”<sup>[3]</sup>王韬,请其削正并作序。王韬不久即为待出的《易言》写出序言<sup>[4]</sup>。序中,他感佩郑观应直衷热肠、忠肝义胆、慷慨激昂的忧世救时之心,赞赏《救时揭要》和未成书的《易言》书稿词畅意显,直

[1]关于王韬和郑观应初次交往的时间有待进一步考实,此处暂从光绪元年说。

[2]从现有资料来看,光绪元年时,郑观应不可能写成《易言》。只能说此时郑有撰写《易言》的打算,或者郑寄给王韬的只是尚未成书的《易言》的部分篇目。

[3]王韬:《易言》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4]关于《易言》的成书时间,易惠莉《郑观应评传》有专门讨论,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85页。

陈无隐的行文风格,称赞郑观应为“今之有心人”,同时期盼有朝一日郑能受擢拔而出山,将书中所言“措诸施行,而收其功效”<sup>[1]</sup>。约四年后,《易言》全部完稿。光绪五年(1879)春,经郑观应一友人书信推荐并牵线,王韬又一次通读了刚刚成书的《易言》书稿,但荐举人请王韬“就正”的愿望却因王随后的赴日访问终止。约五个月后王韬回到香港。也许手头事务繁杂,直到光绪六年(1880)六月,王韬才重拾旧事,做起了推介《易言》的一系列工作。他先是在《循环日报》转录上海《申报》刊发的郑观应所撰《蠡测罪言》一文,半个月后,又从《易言》中选录郑观应的《论出使》充作《循环日报》“论说”。又越一月,王韬撰写的“跋铁城杞忧生《易言》后”也分两次刊载于《循环日报》。约略同时,《易言》由王韬亲自校雠并交由他主持的香港中华印务总局承印出版<sup>[2]</sup>。书出时,王韬所撰的“序”、“跋”分列该书首尾,一同刊出。

上述一系列相继推介《易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留有王韬对“杞尤生”和《易言》的高度评价。如转录申报《蠡测罪言》时王韬特地写按语称:“杞忧生今之有心人也,曾著《易言》一书,于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其利病所在,言之皆动中窍要,而于中外之情尤稔,《申报》主人称其学识明通,遍历地球,海邦情形皆其素悉,发为闳议,见者罔不心折。诚然哉!近期所作《蠡测罪言》,于论中俄情事真可谓洞垣一方矣,杞忧生之经济不可于此覘之哉!使其得时则驾见之施行,俄之强何足虑哉!”<sup>[3]</sup>选录《论出使》时亦加写按语云:“此余友铁城杞忧子所著《易言》之一也。《易言》一书,议论纵横,识见透辟,坐而言者可起而行,长沙敷陈之策,宣公奏进之篇,不是过也。今登其《出使》一论,先见一斑。呜呼!即其说而观之,不尤切于近日之时势也哉?”<sup>[4]</sup>随后所撰的《易言》跋更明确的称“杞尤生之书,大抵发愤之所为作也”,言其“发上指而笔有泪”,肯定“杞尤生此书盖救时之药石也”<sup>[5]</sup>。

除了以上在公开场合对《易言》的大加抑扬外,在私下的信函中王韬依然重申了这些评价,而且有所延伸。光绪七年(1881)春,王韬又专门复函郑观应,再一次诚挚的对《易言》表示高度认可。信中除了赞佩郑观应“经济宏深,识见高卓,洞垣一方”外,王韬更是特意肯定了《易言》朴实直白的文风。“夫著书在通时适用而已,文词其末也。輒近文人,动矜奥博,而宣尼辞达之旨亡,著书之本意亦晦。《易言》一书,遣词命句,纯祖陆宣公奏议。欧宋修唐书,不尚骈俪,而独收宣公所作,亦未足为病也。”<sup>[6]</sup>陆贽是唐德宗时的著名宰相,同时也是引领唐代文风由骈向散转化的先锋,他骈中求散、融散入骈、明白晓畅,少用典故的文风对后世影响很大。王韬肯定“不尚骈俪”的欧阳修修《新唐书》时唯独推崇和偏爱陆贽的奏议,将其援引书中,并说《易言》的文风“纯祖”陆贽的奏议,这已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了。

王韬对“杞尤生”和《易言》的这些评价,也是王韬和郑观应思想交流的缩影。王韬如此不惜笔墨又倾心倾力地宣传“杞尤生”和《易言》,其基本动力正来自于二人思想的共鸣。概而言之,王韬赏识郑观应的主要是对郑蒿目时艰,眷怀家国的济世情怀、熟悉中外大势的开阔视野、应对有方的自强方略,甚至包括不尚华丽,浅近直白文风等的高度认可。而所有这一切又无不都是王韬具备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素养和风格。换一种角度看,与其说王韬是在大力揄扬“杞尤生”其人其书,还不如说王韬是在借机尽力为同一时期的“变法自强”思想的开展推波助澜。就此而言,王韬对郑观应及其《易言》的揄扬,也是王韬对1880年代变法思潮的有力推动。王韬《易言》跋中的“十年徒长,深幸同时”<sup>[7]</sup>

[1]王韬:《易言》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2页。

[2]光绪六年(1880)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的两册本《易言》,上下卷结束时都注有“天南遁叟校雠”的字样。

[3]《录杞忧生〈蠡测罪言〉》,《循环日报》,庚辰年六月初六日。

[4]郑观应:《论出使》,《循环日报》,庚辰年六月二十日。

[5][7]王韬:《易言》跋,《郑观应集》上册,第166-168页,第168页。

[6]王韬:《与郑陶斋观察》,《骛园尺牘续钞》卷二,光绪十五年(1889)铅印本。

一语,其实恰好道破了这一主旨。因此,王韬所撰的《易言》跋,既是王、郑二人在变法自强思想上深获共鸣的记录,也是引领和推动同一时期中国思想变革的宣言和纲领。对出道不久的郑观应来说,王韬的介入和鼓动,则收如虎添翼之功,它不仅加重和壮大了洋务思潮的声势,而且扩展了郑观应的个人影响<sup>[1]</sup>。总之,郑观应其人其书知名度的提升,郑观应变法主张的渐次普及和声张,王韬确与有功焉。

能够体现王韬和郑观应思想交流的还有上边提到的光绪七年春王韬写给郑观应的信,这也是目前仅存的一封王韬致郑观应信函。这封信,王韬除了对郑观应的《易言》大加褒扬和有所评论外,同时也告诉郑观应他的一本旧著《火器略说》也于近期已经重印出版。他向郑交代,重印该书的目的,是因为“迩来日俄有事”,故“施放之秘、测量之要,弹丸火药轻重之术不可不讲”,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使军营员弁“手持一编,奉为圭臬,庶几有准有则,无所偏倚”,“出奇制胜以收效于疆场”<sup>[2]</sup>。当时,中俄伊犁之争的双方谈判正在进行,战与和的趋向一直牵动着国人的神经,王韬、郑观应均概莫能外。郑在《申报》发表《蠡测罪言》,就中俄冲突出谋划策,王韬在信中专门介绍《火器略说》,显然也是有备而来,它也又一次说明了王、郑二人在关注中外时局上的心心相印。

这封信末尾还提到王、郑二人当初曾有过载酒看花、醇酒妇人,“醉于红蕖小阁中”<sup>[3]</sup>的经历,虽然目前对二人究竟何时见面相识,还无从确认,不过,此前王韬只在光绪五年赴日访问时途经上海,由此可知,这次上海的短暂停留,很有可能是王韬和郑观应见面结识的开端。

继《易言》出版之后,郑观应另一部著作《盛世危言》(五卷本)的出版同样倾注了王韬的心血。郑观应致王韬函称,该书出版前曾请王韬审订过“学校”附录等若干篇章的内容。信云:“紫诠先生大人史席:日来想贵恙已痊,念念。顷承友人送来岩茶二箱转呈,晒纳勿却。又幸尚有《学校》附录仍乞削正,连前呈之两则,于是晚或明晨掷下付印尤感。”<sup>[4]</sup>郑观应所提到的《学校》附录,即指王韬所作的《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才论》<sup>[5]</sup>。与以前的《易言》相比,《盛世危言》(五卷本)在体例上加了不少附录<sup>[6]</sup>,这些附录均为时人撰写的有关时务的文章或选录《申报》、《沪报》等的“论说”,除王韬外,与郑观应熟稔的吴广霈、杨毓辉等人的文章也在其列。继光绪二十年(1894)仲春五卷本《盛世危言》出版后,郑观应在扩充修改有关内容的基础上,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推出了十四卷本《盛世危言》,据书中郑观应所撰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交待,十四卷本《盛世危言》的出版同样受惠于王韬的“参订”。《凡例》提到:“今中日战后,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距作书仅年余耳,而事已迥异,故未言者再尽言之,已数易其稿。请王子潜广文、吴瀚涛大令及深通时务者同心参订。”<sup>[7]</sup>王韬“参订”的,应是这次新增的有关内容,郑“数易其稿”,当然也少不了吸收了王韬的意见。而且,十四卷本《盛世危言》

[1]王韬在《循环日报》刊出《跋铁城杞忧生〈易言〉后一》和《跋铁城杞忧生〈易言〉后二》约四个月之后,远在日本的黄遵宪即致函王韬,询问郑观应的情况,表达对其心仪之情,并向王韬索要《易言》的稿本。函中称:“再读贵报,有杞忧子《易言书后》二篇,是公著述,偶曾一读,心仪其人,访其姓名,仅知为岭南人,姓郑。尊处有《易言》稿本,可赐一读否?”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35页。个别标点断句有改动。

[2][3]王韬:《与郑陶斋观察》,《弢园尺牍续钞》卷二。

[4]郑观应致王韬函,原件不知所藏,今据原函影印件,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书前插页《郑观应致王韬手迹之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据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最初的《学校》篇附录,仅此一篇。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收有该篇附录3篇,包括了后来增订本的内容。

[6]今藏南京图书馆的《盛世危言》(五卷)光绪二十年(1894)春刻本,共收录各类附录13篇。

[7]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郑观应集》上册,第238页。

在增加《捐纳》篇时,还收录了王韬的文章《停捐纳论》一文<sup>[1]</sup>。另《凡例》中还提到“或有见是说者(指十四卷本《盛世危言》,萧按。)乃比之贾长沙、陈同甫痛苦陈词,则吾岂敢?”<sup>[2]</sup>说“岂敢”当然是谦辞。不过,这里的“或”,明眼人知道,至少包括王韬,甚至说主要就是王韬。因为王韬赞誉郑观应的《易言》时,即有“陈同甫无此精详,贾长沙逊兹剴切”<sup>[3]</sup>的论断。如此说来,此处郑观应的说法比王韬还稍微保守了一点。十四卷本之后,还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再订出版的八卷本《盛世危言》,只是这时,王韬已经辞世三年,他已没有再度“参订”《盛世危言》的机会。但从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开始,直到王韬逝世后重订的八卷本《盛世危言》出版,郑观应都在书末附有王韬在光绪六年(1880)为《易言》所撰的“跋”,而这也正是有别于五卷本《盛世危言》的一个重要变化。可见王韬对《盛世危言》的影响并不因他的离世而消失。

## 二

王韬和郑观应的其它交往还有一些。其中较重要者约有以下三端:一是王韬数次请郑观应为格致书院考课命题;另一是在孙中山、康有为赴沪拜谒王韬的过程中,郑观应均充当陪客。三是王韬晚年因生活所迫,入不敷出,曾不止一次乞求盛宣怀,希望盛能在轮船招商局和上海电报局等机构中为他支取一份额外薪俸。由于郑观应和盛宣怀工作上的密切联系,加之王韬和郑观应也较为熟络等因素,王韬有时候也请郑观应从中说项,凡此数端,无一都是王郑二人来往过从密切的真实记录。

格致书院是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于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倡议设立,终于在光绪二年(1876)落成的一所旨在讲求格致实学的教育机构。在引介和推广近代西方科技知识,作育人才方面成效显著。光绪十年(1884),王韬举家由港迁沪定居,鉴于他的中西学养和在当时文化舆论界的影响,格致书院董事会于第二年即聘他接任格致书院监院。王韬受聘后,以课士之法,招徕学徒,一时四方闻动,很受欢迎。考课最初只有季课,一年四次,后在光绪十五年(1889)又增加春、秋两季特课,专请南北洋大臣命题阅卷。命题人当中,包括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等朝廷、地方政要。此外,邵友濂、薛福成、周馥、龚照瑗、盛宣怀等要员也在其列。命题人均由王韬出面延请。光绪十九年(1893)和光绪二十年(1894)冬,时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的郑观应应王韬邀,先后两期为格致书院考课命题。命题计7道,其中十九年3道,二十年4道。命题涉及中国开设议院的利害、中西技艺书院的设立情况对比、现有的西学馆、制造局等的振兴、中国能否以及如何举办恤贫院?中国如何取法西方兴办学校、如何派遣留学生?如何准古宜今、取法西人改造当今农业?如何效法西方办好艺塾、鼓励商民设办商厂等诸多现实问题<sup>[4]</sup>。这些命题无一不有感而发,现实气息扑面而来,许多问题不仅是郑观应认真思考、已在《盛世危言》论列的问题,而且个别问题一直还是时人关注的焦点。以议院设立问题为例,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最早明确提出设立议院的思想家之一。最早问世的五卷本《盛世危言》即写有《议院》篇。但反对声也一直不绝于耳,争论激烈。郑以议院问题考课格致书院士子,正值该书付梓前夕,不排除郑欲借此机会倾听年轻学子们的心声,试探外界对此之反应,同时也借机对议院设立问题做点宣传和解

[1]《停捐纳论》即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停捐纳》,收入《弢园文录外编》卷二。《盛世危言》十四卷本收录本文以作附录时,加有“王子潜广文《停捐纳论》”的标题。两文内容和文字完全一致。

[2]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郑观应集》上册,第238页。

[3]王韬:《与郑陶斋观察》,《弢园尺牍续钞》卷二。

[4]郑观应原命题俱见郑观应:《癸巳年上海格致书院冬季课命题三道》,《甲午年上海格致书院冬季课命题四道》,《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217页。

释,以排除时人对议院的排拒心理。郑多年后这样述说当初命题的目的:“内外大吏不愿立宪,委为明智未开,需待十年,识字者有十之八九而后可行。职是之故,弟曾于癸巳冬课上海格致书院诸生,题为《议院论》,均言有利无害,宜速立宪、开国会以固民心。其要以定议员人格为先务,已详载于《盛世危言》。”<sup>[1]</sup>郑的这段回忆虽为时过境迁之语,但它清晰地说明,他此次课考“议院论”,确是有的放矢、意向鲜明的深思之举。

郑观应的课题得到了应试士子的积极响应。由王韬主持编纂和刊刻的《格致书院课艺》收录了被郑观应评阅定为超等的许象枢、杨史彬、陈翼为等三人的课艺。三篇课艺均以“议院利害若何论”为题。其中,许象枢的课卷颇得郑观应赞许,光绪二十六年(1900)《盛世危言》八卷本出版时郑还将此文作为附录收入,并添写按语云:“癸巳冬,余课上海格致书院肄业诸生,题为《议院论》。苏州许生象枢文最佳,兹附录于后。”<sup>[2]</sup>许象枢原名许庭铨,是王韬同村好友许起之子,其课艺曾三次在格致书院获奖。

郑观应的课题也得到了王韬的回应。原来,王韬编纂格致书院学生课艺时,对经各大员评阅的课艺,除极少部分外,大多都逐一写有或详或略的评语。如王为许象枢课艺所加评语云:“三艺悉能持议明通,按切时势以立言,明彻四际,洞垣一方,非由平日留心世务,蒿目时艰,安得臻此。窃谓今日欲收自强之效,固在变旧法、融成见、除积弊、仿西学,而苟非破隔阂、辟畛域、上下一心、君民共主,亦未易言之也。”<sup>[3]</sup>在另一位福建侯官县癸巳恩科举人陈翼为的课艺上批道:“首艺通篇立意以重民为主,自是探本破的之论,泰西议院之设,亦与中国皇古之道相吻合,固中国而行此,足立富强之本。”<sup>[4]</sup>王韬是近代中国最早倡导“君民共主”的思想家,他一再呼吁君民共主,希望以此“破隔阂、辟畛域、上下一心”,从而使变法自强收到实效。其实仔细推究,王韬的“君民共主”论和郑观应的“议院论”实同名似,二者并无本质性差异。只是相对说来,在不少公开言论中,王韬的“君民共主”论略显含蓄和小翼翼,避开了要求开设议院的忌讳,仅此而已。但从王韬写给陈翼为课卷的批语来看,至少在甲午战争前后,王韬已经有了明确主张设立议院的思想,他的“固中国而行此,足立富强之本”的论断,语气坚定,掷地有声,几同郑观应的主张如出一辙,显然,到此为止,王郑二人在议院设立问题上已经心心相印了。故而,王韬编印格致书院课艺时所留下的这些批语,也是王韬和郑观应在中国要不要开设议院问题上思想相互呼应的真实反映。

说到王韬和郑观应的交往还不能不提到光绪二十年(1894)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孙中山和康有为先后来沪上拜谒王韬之事,而这两件事情几乎都是王、郑二人一同出席、且由郑观应亲自引见并陪同的情况下完成。孙中山来上海拜谒王韬一事,发生在光绪二十年春夏间。光绪十九、二十年之交,孙中山因经营广州东西药局失败,遂回翠亨老家与家人团聚,在此期间,他写成上李鸿章书稿,萌发以上书李鸿章实现其“中央革命”<sup>[5]</sup>理想的念头。为了确保事情的顺利进行,他专程赴港找友人陈少白商讨对策,斟酌信函字句,另找熟悉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港友写好介绍函,还邀请颇为熟谙上海情形的上海电报局译电生陆皓东与其一同北上赴沪。“既抵沪,暂寓三洋泾桥名利客栈,藉港友函介,分访王韬、郑观应诸人。”<sup>[6]</sup>郑观应和孙中山此前很可能已经认识,至少二人已有一定程度之了解。郑的五卷本

[1]郑观应:《与潘兰史征君论立宪书》,《郑观应集》下册,第300页。

[2]《郑观应集》上册,第324-327页。

[3][4]王韬:光绪癸巳年课卷批语,《格致书院课艺》不分卷,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

[5]冯自由在《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中称:孙中山写成上李鸿章书稿与陈少白讨论时说:“吾辈革命有二途径,一为中央革命,一为地方革命,如此项条陈得鸿章采纳,则借此进身,可以实行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少白亦以为然。”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3页。

[6]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3-14页。

《盛世危言》《农功篇》中就写有孙中山在家乡试种鸦片,并欲赴欧洲学习种植新法,加以推广,以杜绝鸦片之害等事实。有关孙中山“分访”王韬、郑观应的详细情况,因史料所缺,目前还难以陈述清楚。但根据孙中山找到郑、王二人的事实判断,孙中山很可能先找到了郑观应,并详细陈述了他赴沪和北上之途的来由和打算。由于王韬是孙中山本拟拜谒的对象,加之孙带有《上李傅相书》这样一份重要的文字材料,而郑观应对王韬在思想及文字润色方面的突出才能一向推崇备至,或许在此前提下,郑对孙的拜谒王韬之举极力支持,并乐于引见。正是在郑观应的积极引介下,孙中山拜谒王韬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孙见到王韬后“总理出示上李书稿,韬深为赞许,仅代修订数语,并为函介于直督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sup>[1]</sup>。王韬对孙的“深为赞许”、“代为修订”、“并为函介”,这一连串的举动真切的透露出王韬对眼前这个不期而遇的年轻人的倾力支持和极度喜欢。老病颓唐的王韬似乎从中看到了英贤继起和后来居上的希望。与王韬一样,郑观应对孙中山的举动也竭尽支持之忱。为此,他专门致书盛宣怀,对孙加以引荐。称孙“少年英俊”、“留心西学”,“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言其北行之目的“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sup>[2]</sup>。王韬和郑观应的努力最终都因李鸿章忙于朝鲜战事而作罢。但在王韬的努力下,孙中山的这份上书稿终以《上李傅相书》为题(署名“广东香山来稿”),分期连载在了当年第69、70册的《万国公报》上。

王韬、郑观应对孙中山的大力提携和支持,实际上是对引为同道的中国年轻改革者的支持,是对变法自强事业的声援和呼应。虽然孙中山后来走上了与王、郑二人设想并不相同的振兴中国之路,但王韬、郑观应联袂推动孙中山北上津门上书李鸿章的举动,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仍然非同凡响。

继孙中山赴沪拜谒王韬之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以鼓动“公车上书”和创办北京强学会而声名大噪的康有为也赴沪趋谒王韬,由此构成王韬和郑观应以及康有为交往活动中的一端佳话。北京强学会建成后,急于扩展强学会声势的康有为又把工作重点转向上海。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康有为亲临沪上,游说宣传,为组建上海强学会积极奔走。上海强学会以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为标的,其争取和活动对象主要应是文化和知识界群体。自开埠以来,上海向为东南人才汇聚之地,士子学人云集。尤其是王韬自回归上海定居后,占据沪上文化名流顶端,声名显赫。郑观应也因《盛世危言》的问世,名重一时。职是之故,此番康有为赴沪,王、张二人必定是康联络和工作的重点。加之此前不久王韬还受张之洞托,为其编纂《洋务辑要》,交流较多。郑观应多年置身洋务企业,早在中法战争前后,已同张之洞有所联系,受其赏识。此等因素,都非常有利于打着张之洞旗号前来活动的康有为同王韬和郑观应的联系。同孙中山拜谒王韬一样,康有为先联系了郑观应,后经郑观应牵线,康有为拜见了王韬,并同游上海格致书院。现存的一份郑观应致王韬函记述了此次活动的大致梗概。信中说:“紫诠仁兄先生大人阁下:康长素主政奉南皮命到沪设立强学总局,约弟午后两点钟同谒先生,邀往格致书院一游。冗次匆匆,手此驰达。敬请大安,不具。教弟应十月十五日。”信写成后,郑又于信尾空白处加有一句“昨晚已将南皮序送昕伯先生登报,不悉已阅否?”<sup>[3]</sup>的附注。昕伯,即钱征,系王韬女婿,浙江吴兴人,秀才出身,时任《申报》主笔。南皮序是了解康有为赴沪缘由和上海强学会创办宗旨的凭借,郑对王韬的这一提醒表明,康之拜访王,有着极强的目的和针对性,它不是一次简单

[1]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3-14页。

[2]郑观应:《郑观应致盛宣怀函》之三(一)(影印件),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图书馆、澳门博物馆编:《郑观应文献选集》,《郑观应档案名人手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页。

[3]郑观应:《郑观应致王韬函》,原件藏常州博物馆,今据原件影印件,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书前插页《郑观应致王韬手迹之一》。

的礼节性拜访,因此,希望王韬提前有所准备,以做到会面时心中有数。不久,上海强学会成立,但《强学报》创刊号刊载的该会16位发起人名单中并不见王韬之名<sup>[1]</sup>。同时,参与并卷入这场活动的郑观应同样也不在其列。此事最终无疾而终的具体原因不甚清楚。不过,仅就以对孔子之道极其推崇,并寄望于以此实现天下大同的王韬而言,他不大可能对企图以一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即欲动摇孔子形象和地位的康有为心存愉悦,更多的很可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芥蒂和不满。如此来看,胸怀变法自强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终生的王韬与康有为的这次变法活动失之交臂也似在情理之中。

郑观应不仅在孙中山和康有为进见王韬这些短暂的活动中之牵线搭桥,充当陪客,而且在王韬和盛宣怀一些交往中也起过重要作用。

王韬与盛宣怀相识于光绪初元。光绪十年(1884)王韬回沪定居后,二人交往更加密切。王与盛之交往,更多的是王韬经济上对盛宣怀的某种依赖。王回沪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为手头拮据叫苦不迭。主要是日常居住和生活日用以及刻书之费开支较大所致,而所有开支中,刊刻书籍的费用占据大头。王著述繁富,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将全部著作逐一面世,但限于资金紧张,刊刻出版者仅极少一部分,为此他心有不甘。此外,晚年经常患病,而医药费用昂贵不菲;加之为孙子订婚,修建新居以及偶尔的载酒看花等活动,花销都很大。面对捉襟见肘而又苦恼不堪的生活现状,王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盛宣怀等一些洋务官员身上。他寄望盛宣怀的就是能在盛执掌的轮船招商局和上海电报局中领取固定“修金”,以作著述和刻书之资费。为此,他几乎竭尽乞求之所能,屡屡要求不止。光绪十九年四月,盛宣怀与王韬在上海见面,当面许诺按月资助王韬,但后来却一直久拖,未见落实。为此,王韬念念不忘,除一再致函盛宣怀恳求外,还致函郑观应请其说项。当年九月,郑观应北上天津面见盛宣怀时,王即“托其代达下忱”<sup>[2]</sup>。从现存的一些零星的郑观应致王韬函件可知,郑观应围绕此事,做过不少工作。很多时候,王韬催得很急,郑都一一认真办理,并及时回复。而且,所有王托郑所转盛宣怀之函件,郑都郑重当面转呈,以防事有闪失或耽搁。譬如,有一回郑刚收到王韬的求助函,即立即回复,并答应当面请盛表态“索其回音”。函云:“紫诠先生大人阁下:是午承赐之函,拟明午弟面与杏翁一阅,索其回音。恐加封送去,不暇即覆,日久又忘记也。知念。先此驰覆,敬请撰安,不具。教小弟观应,十月廿五。”<sup>[3]</sup>

另一回因王韬接二连三,连续两天每天致函郑观应,催促其在盛面前为其刊刻书籍费用的落实说项,郑立刻照办,在面见盛宣怀转呈王韬的求助函并获盛口头许诺后,郑回复王韬,告诉其所求事盛已当面允诺,资助出版前景乐观云云。函称:“紫诠兄仁大人阁下:昨今两展手书,均已敬悉。今日谒督办,已将尊扎面呈,前途亦颇许可,而数目则未出诸口,想必有以扶大雅之轮也。专此泐复,敬颂著安,惟希朗照不备。众心既出《国语》,可解疑义,阅教受赐多矣,又及。教小弟制郑观应,十月即日。”<sup>[4]</sup>

这些事几乎都是在很短时间之内完成。透过此二函,王韬求解燃眉之急的迫切心情和郑观应处事的耐心认真及挚恳慎重之态都跃然纸上。后一封函件还表明,在郑、王二人的日常交往中,郑观应还不时向王韬请益问学,这也真切展示出郑观应和王韬交往中亦师亦友的若干细节。

[1]王栻:《参加上海强学会人物及其派别情况表》,王栻:《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144页。

[2]王韬:《王韬致盛宣怀手札》四十八之二,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八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8页。

[3]郑观应:《郑观应致王韬函》之影印件,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书前插页《郑观应致王韬手迹之三》。

[4]郑观应:《郑观应致王韬函》(影印件),上海图书馆、澳门博物馆编:《郑观应文献选集》,《郑观应档案名人手札》,第323页。

## 三

集中展示王韬影响郑观应思想的著述,当首推王韬所作的《易言》跋。该跋写就于光绪六年(1880)中元节,由于数年前王韬已为未成书的《易言》写过序,因此,王韬这篇文章就被其分别冠以“跋铁城杞尤生《易言》后”、“杞尤生《易言》跋”等标题存世,收入《易言》时,该“跋”与早先的“序”一首一尾,前后呼应。王韬一生为人作序无数,但前后两次为同一个人的同一本著作作序作跋,据笔者所见,仅此一回。这也许纯属偶然,但从另一面也反映出王韬对郑观应所著《易言》的高度重视。

《易言》跋对郑观应思想的最重要的影响主要在于,王韬以道器观的形式全面论证了学习西学和坚持中国传统五帝三王以至孔子之道的辩证关系,从全局上为郑观应《易言》中的一系列洋务主张拨正了方向。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郑观应只注意讨论时务细节,而疏于对救时自强等一系列举措进行理论思辨的不足,也正是在王韬《易言》跋的引导下,郑观应的救时改革思想的理论化色彩才得以突出,从而在整个思想的体系性方面有了较大改进。

王韬是中国近代早期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理论家,他的洋务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他自行总结并加以阐发的“循环论”,王韬的“循环论”以鸦片战争后中西相互交融的时局为背景,借助古老的“天道循环”学说,系统论证了中西方国家盛衰强弱演变的基本规律,由此构筑了一幅新的变局下的走向世界大同的新图景。

循环论认为,西人东来,是“一道同风”的道化世界形成之始,中国应以此为契机,求霸图强,但崇尚霸功,即学习西方、变法自强并不是“循环论”的终极;实施“王道”、“以德立国”、“以仁守位”,构建一繁荣兴盛的德化社会,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孔子之道主宰全球的“一道同风”的道化世界则是“循环论”的最终目标。王韬的“循环论”及其构筑的大同理想造端宏大,思想深邃,是近代中国颇具理论思辨和具有一定体系的重要思想之一,在当时即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郑观应,约略与王韬同时或稍后的其他思想家如吴广霁、陈炽、政府官员郑藻如等也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它的影响。

虽然王韬和郑观应在关心时务和“每欲以一得之效献诸当事”<sup>[1]</sup>等行为模式和思想倾向方面颇多一致,但由于二人思想境界和理论功底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无论《救时揭要》和《易言》基本上都是对中国现实时务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建言献策,就事论事是其基本特点。对此,长于高屋建瓴和理论概括的王韬大概已有所察,加之在粗览《救时揭要》、为未成书的《易言》作序时,或许由于二人并不熟悉及该书尚在计划之中,因此,王韬当时只是临时写了一些空泛而又带有鼓励性的冠冕堂皇的赞语。数年后,当《易言》成书,并在内容和风格方面出现明显长进、尤其是王郑二人已有所熟悉的情况下,王韬开始对郑观应有关时务策论的不足有所提醒和补充。当然,这些较为隐晦的工作是在高度肯定《易言》的前提下进行的。

王韬的《易言》跋不把重心放在《易言》本身,而是居高临下大谈中国亟需“变法自强”并抛出“道器论”及与之相关的大同思想的一个原因或正在此。尤其是跋中王韬所言的“杞尤生之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sup>[2]</sup>这句看似开脱却又极具纲领性的话语,对郑观应触动很大。此外,跋中所宣示的“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西人在今日所挟以轻藐我中国者,即他日有圣王起,所藉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sup>[3]</sup>等观点,也无一例外对郑观应产生了明确影响。郑在心领神会之余,重新开始了对《易言》的修订和篇目上的补充和重组。所以,当光绪

[1][2][3]王韬:《易言》跋,《郑观应集》上册,第165页,第166页,第166-167页。



二十年(1894)春五卷本《盛世危言》问世时,人们看到的便是一副在内容和篇章结构上都明显不同于往日《救时揭要》和《易言》的新面孔。

新版《盛世危言》首先从篇章结构上突出了郑观应救时自强思想的系统性,将以坚守王道理想为本,以学习西方为辅,最终回归“一道同风”的大同世界的理念贯穿其中,从而留下了深受王韬《易言》跋影响的印痕。

这一深刻的思想印痕首先是从全书以《道器》开篇,并以此统领全书内容作为开端的。道与器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近代的中西关系,核心是新的变局下中国要不要学习西方?学习西方学什么?学习西方是否是治理中国的全部和根本?中国靠什么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立足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王韬很早就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他一开始即认为,只有学习西方变法自强,中国才能实现振兴,但是,西学“治痛之药石也,急则用之耳”<sup>[1]</sup>,是“治之具,而非即以为治者也”<sup>[2]</sup>,真正的治者,应是中国的孔子之道及其王道理想。他用内外本末概括其洋务纲领,认为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是“本”,亦是“治之内”,治兵、师西法是“末”也是“治之外”,只有由本及末,由内及外,以此变法自强,中国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也只有循此重民为本的治国路线,“郅治之隆”的大同盛世才会随着东西方世界的合一而真正到来,作为人伦之至的孔子之道才会重放光彩,风行天下。

王韬这一整套的变法自强思想理论体系不仅形成很早,而且对此他坚持颇力,并深具影响力。从1870年代初刊示于《香港近事编录》的《答〈强弱论〉》,到随后陆续发表于《循环日报》等报刊的一些倡导变法自强的文章,从中都不难找到王韬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身影。广泛阅读近代报刊并博采众长,编撰著述是郑观应写作《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的主要特征之一,《易言》跋的问世与提醒,尤其是从光绪九年(1883)开始,王韬的洋务政论集《弢园文录外编》的陆续出版<sup>[3]</sup>,这无疑对郑观应从思想深层接受和理解王韬这一整套的变法自强思想的理论体系提供了绝好的便利。新版的五卷本《盛世危言》以《道器》开篇,置之卷首,不仅从外观上模仿了王韬已版的《弢园文录外编》置《原道》于首篇的做法,而且在《道器》具体内容的论证上也与王韬《原道》亦步亦趋。在《道器》篇中,郑观应既论证了行而上者道,行而下者器,器由道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等道理,而且还拐弯抹角的构筑了一套“由博返约”、由学习西学“而折入孔孟之正趋”,最终实现由霸图王,四海归仁的“大一统之宏规”<sup>[4]</sup>的理想。郑观应《道器》篇这种从外到内刻意模仿和步武王韬《原道》的现象说明,《盛世危言》《道器》篇的问世,恰是郑观应具体实践和忠实回应王韬《易言》跋中取西法之“器”、守孔子之道以及天下由此走向大同的思想主张的开始。

这一深刻的思想印痕还可以从新版《盛世危言》在篇目安排上着意增加和突出以教育、教化和注重民俗民风培养为核心的传统重民思想这一主题的分量上表现出来。新版五卷本《盛世危言》共收文56篇<sup>[5]</sup>。从全书整体排列结构来看,继《道器》篇之后,大体按教育(含《学校》、《西学》、《考试》等3篇);政制(含《议院》、《日报》、《吏治上下》、《廉俸》、《书吏》等6篇);教化(含《教养》、《训俗》、《善举》、《藏书》、《狱囚》、《女教》、《医道》等7篇);外交(含《游历》、《通使》、《公法》、《交涉》、《禁烟上下》、《传教》、《贩

[1]王韬:《请兴西学议》,《弢园文录》卷八,稿本。

[2]王韬:《变法自强下》,陈正清点校,《弢园文录外编》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4页。以下未注明者均指同此版本。

[3]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先后分三次出版,具体情况笔者《〈弢园文录外编〉的版本问题》一文有详细论述,见《近代中国》第十六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336页。

[4]郑观应:《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第243页。

[5]据笔者查证南京图书馆所藏光绪二十年春(1894)五卷本《盛世危言》,实际共收正文56篇,另有附录13篇。

奴》等8篇);工商(含《税则》、《商务》、《商战》、《技艺》、《纺织》、《赛会》、《铁路》、《电报》、《邮政上下》、《银行上下》、《开矿》、《铸银》、《国债》等15篇);农业(含《农功》、《垦荒》、《旱潦》、《治河》等4篇);军事(含《建都》、《防海上下》、《防边上中下》、《练兵》、《民团》、《水师》、《船政》、《火器》、《弭兵》等12篇)等7个部分排列。显然,突出“教育”、“改制”与“教化”在全书的地位与分量是《盛世危言》在篇目结构上出现的新变化,这也是郑观应继首篇明确“道”“器”关系之后在篇章结构设置方面的一大新举措。

这些突出“教化”和“王道”主题的篇目主要有《学校》、《西学》、《议院》、《日报》、《教养》、《训俗》、《善举》等,集中于五卷本《盛世危言》的第一、二两卷,均系新增新撰。这些篇目集中起来,主要讲述了人才和教育以及民风、民俗的养成是政治之本,即“道”由教成,“政”之基在“教”,“教”之基在“民”这样一个传统王道政治的基本道理。如郑观应在《学校》、《议院》篇中反复表达的就是“士”之教育和培养关乎国政兴衰,是民情能否通达的关键。因此,教育兴则人材盛,人材盛则国政清,国政清则国威张、外侮御。而在《教养》、《训俗》、《善举》等篇目则又论证和说明,政之成不仅取决于士习,而且取决于世道人心,民风民习。因此除了兴教养士,培植国本之外,乡间百姓的生计,民风民俗的教化养成都是“有国家天下者”<sup>[1]</sup>必须肩负的重任。经过这样一番从上到下对“民”的教育、教养、化俗的精心设计和论证,一个“士得教而民有养”<sup>[2]</sup>、鳏寡孤独皆有所恤,“俗美化行,乱萌潜杜”<sup>[3]</sup>、民风淳美的王道景象终于完整的展现在了人们眼前。

这幅图景正是王韬《易言》跋中所倡导、所期待,而原《易言》中恰恰缺少或者不甚明朗的图景。有了这幅图景,《盛世危言》以民为本,王道优先的主题愈加清晰和突出,昔日《易言》留给人们“将率天下而西国之也”的印象和随之可能而来的“此书出,天下必将以杞尤生为口实”<sup>[4]</sup>的局面都将彻底改观,原来《易言》略显琐屑和短视,缺乏总体方向感和整体感的缺陷得以弥补,“道为本,器为末”的自强纲领得以落实,万世不变的孔孟之道的尊崇地位得到保障。可见《盛世危言》新增这部分以重民教养为题材的篇目,实为该书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这是郑观应救时自强思想走向系统化的关键一招,也是郑观应从思想深处对王韬的变法自强思想理论体系认同并保持一致的一大标志。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篇章结构上的这一新举措,其思想动力主要来自《易言》跋和王韬的一系列有关重民思想的论述,毋庸置疑。虽然,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和《易言》均不乏对中国传统重民思想的阐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传统民本政治的核心术语也偶尔散落于其笔下,甚至“圣人之道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文教之敷,于是乎远矣”<sup>[5]</sup>的愿景,他也时有所盼。然而,由于总体上缺少对兴西学和重儒道二者关系的思考和把握,不仅二者的轻重缓急未能恰当拿捏,而且界限有所模糊。所以《易言》的整体格局始终倾向于重洋务而轻内治,似乎兴西学才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不二法门。在此前提下,王韬的《易言》跋将“万世而不变更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sup>[6]</sup>这一变法自强纲领的重要规条亮出,这对郑来说,无异于醍醐灌顶。显然,同郑在《盛世危言》中首列《道器》篇一样,在《盛世危言》中突出教化和王道也是郑观应积极回应王韬《易言》跋并将之加以具体落实的重要表现。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篇章结构中着意突出教化王道这一举措或也与1870年代中叶后王韬强调民本兵末、批评洋务运动舍本逐末,“徒袭皮毛”的论调有关。大约从光绪元年开始,王韬在力主西法变法自强之余,开始了对治民重民等传统民本思想的强调。他多次在私下或公开的论著中直言:“今

[1][2]郑观应:《教养》,《郑观应集》上册,第479页,第480页。

[3]郑观应:《训俗》,《郑观应集》上册,第488页。

[4][6]王韬:《易言》跋,《郑观应集》上册,第166页,第167页。

[5]郑观应:《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65页。

夫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sup>[1]</sup>，“而非徒恃乎西法也”<sup>[2]</sup>，“治民本也,仿效西法末也”<sup>[3]</sup>。他批评单纯模仿西法以求自强的行为是“徒袭皮毛”<sup>[4]</sup>，“有其名而鲜其实”<sup>[5]</sup>的“徒变”<sup>[6]</sup>。他甚至很形象的比喻说：“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厂局之铁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sup>[7]</sup>这些说法大都不断重复着正人心,厚风俗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醒目且极有针对性,其中的不少观点已见诸于光绪二年(1876)出版的《弢园尺牍》和光绪九年(1883)出版的五卷本《弢园文录外编》中,另外,也见诸于1870年代的《循环日报》的一些零星的论说中。对于热心时务并对王韬心存倾慕之心的郑观应来说,王韬的这些题旨鲜明的论述,他一定早有所闻。因此,《易言》跋的问世和有力提醒,使他能更深刻的领会王韬这些重民思想的真谛和要义,并将其作为构筑其新的思想体系的知识资源和思想动力。

说到王韬对郑观应的思想影响,还需要提到王韬的另一部名著《普法战纪》和王韬的洋务时论集《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除在新版《盛世危言》中以《道器》篇打头,继之突出有关教化王道的重民篇章,以此主宰全书“重道轻器”株守孔孟王道的立场和方向之外,全书以《弭兵》篇结尾的安排,也颇具匠心,别有深意。郑以《弭兵》终结全书,是为了给笼罩全书的重民王道思想设置一个宏大而又合理的归宿,这就是以“礼齐德道、偃武修文”为基本特征的大同理想。《弭兵》重点论述了“黷武非策,佳兵不祥”,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sup>[8]</sup>的道理,而其中的原始思想主要来自王韬对《普法战纪》经验教训的总结。王韬的《普法战纪》除了从普法战争导致战后欧洲动荡不安,无暇东顾的角度疾呼中国乘此有利时机变法自强外,另一个主题就是认真总结法衰普兴的原因和教训,认为专尚诈力,不施德政,是法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郑观应在《弭兵》篇中主要采纳了王韬的这一思想,并以大量事实揭露战争导致“兵连祸结,扰攘不休”,乃至“生民涂炭”和“身亡国破”<sup>[9]</sup>的危害。值得注意的是,《弭兵》篇许多文字即直接由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慎用兵》、《英但自守》等篇改写而来。如王韬《慎用兵》开首云:“兵凶战危,古圣王不得已而用兵。”<sup>[10]</sup>郑观应《弭兵》开首云:“先王耀德不观兵,诚以兵凶战危,不得已而用之也。”<sup>[11]</sup>以下一段有关欧战兵士伤亡记载的论述亦是,如王韬《慎用兵》云:“伦敦《泰晤士报》内载,泰西各大国军兴以来各款节目,据称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此二十五年中,各国兵兴,其战死疆场者凡一百九十四万八千人,度支库项凡一万二千六十五兆圆,军士之逃亡死伤,房屋货物之焚烧毁坏,概所勿计。”“是以普法蔑土外之战,一日而至十万人;师丹之战,一朝而至数万人;即近日俄土加里布之战,亦顷刻而死伤三万二千人。”<sup>[12]</sup>郑观应《弭兵》云:“《普法战记》载师丹之战一日殒十万人,蔑土之战一日殒十万人,俄土之战加里布一刻殒三万二千人。英国《泰晤士报》载泰西军兴而后,自咸丰二年迄光绪三年止,此二十五年中战死疆场者凡一百九十余万人,费饷项凡一万二千六十五兆员,至军士之积劳成疾,商贾之废业失时,房屋货物之焚烧毁坏,种种伤残不可枚举,兵祸之烈未有过于今世者。”<sup>[13]</sup>其它类似者如:王韬《慎用兵》云:“夫保民与殃民,其心孰善?守土与益土,其

[1]王韬:《重民上》,《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16页。

[2]王韬:《变法中》,《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13页。

[3]王韬:《上当路论时务书》,《弢园文录外编》卷十,第246页。

[4]王韬:《答余谦之大令》,《弢园尺牍》卷十,光绪十三年大文书局铅印本。

[5]王韬:《变法下》,《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第13页。

[6]王韬:《洋务下》,《弢园文录外编》卷二,第27页。

[7]王韬:《代上丁大中丞》,《弢园尺牍》卷十。这句话的类似表达也见于《变法下》。因《代上丁中丞书》约作于光绪元年冬,因此,王韬对洋务运动舍本逐末的批评大约从此开始。

[8][9][11][13]郑观应:《弭兵》,《郑观应集》上册,第925页,第923页,第923页,第923页。

[10][12]王韬:《慎用兵》,《弢园文录外编》卷三,第64页,第65-66页。

事孰公?必有能辨之者。”<sup>[1]</sup>郑观应《弭兵》云:“夫保民与殃民孰善?守土与辟土孰公?与其争强弱于百年,何如享太平于千载?”<sup>[2]</sup>王韬《英但自守》云:“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弗备。”<sup>[3]</sup>郑观应《弭兵》云:“虽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sup>[4]</sup>晚清近人大概缺少像今天这样较为严格的学术规范,否则,郑之上述所为已经算是名正言顺的“抄袭”了。不过,透过这些大量雷同的文字,人们不难体会到《普法战纪》,尤其是《弢园文录外编》对郑观应撰著《盛世危言》的影响,同时这也印证了郑在撰著《盛世危言》、重新改装和完善自己救时自强体系的过程中,对作为全面展示王韬变法自强思想代表作的《弢园文录外编》及其它著述有相当程度的依赖。

当然,深深影响了郑观应思想的发展,最终促使其救时自强思想走向体系化的,最主要的还是那篇《易言》跋。《易言》跋于郑观应思想体系化的形成如此重要,主要在于该跋原本就是王韬变法自强思想体系的高度概括和浓缩,在王韬所有有关其变法自强思想的整体论证和系统说明中,只有更早一些的《答〈答强弱论〉》与其相仿佛。《易言》跋对于《盛世危言》成书和郑观应思想体系形成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夜中北斗,海中灯塔。而且越到后来,《易言》跋和《盛世危言》几如影随形。郑观应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增订问世的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问世的增订新编八卷本《盛世危言》的书末,都无一例外增附了这篇跋。不管这个信号背后还有哪些真意需要解读,但它清楚的说明,郑观应对《易言》跋自始至终的重视程度不仅未曾改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提升。更值得回味的是,在二十世纪初年波涛汹涌的时代浪潮面前,郑观应不为时势所动,日渐沉浸在经由王韬指引,而由他本人构筑的这个由道而器、由教而政、天下归仁,王道和德风洋溢的“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的大同美景中不能自拔。这套思想体系在郑观应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王韬对郑观应思想的深刻影响、都于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肖波]

## On the Contact Between Wang Tao and Zheng Guanying: Also on the Influence of Wang Tao on Zheng Guanying's Thought

Xiao Yonghong

**Abstract:** The contact between Wang Tao and Zheng Guanying centered on the publishing and revision of Zheng Guanying's works. Their interaction was mainly revealed by Wang Tao's influence on Zheng Guanying's thought. The preface to *Yi Yan* written by Wang Tao promoted the updating of the book and the birth of *Prophecies in Times of Prosperity*, thus a significant guide and a motivator for Zheng Guanying's ideological system of self-reliance.

**Keywords:** Wang Tao; Zheng Guanying; preface to *Yi Yan*; *Prophecies in Times of Prosperity*; *Tao Yuan Wen Lu Wai Bian*

[1]王韬:《慎用兵》,《弢园文录外编》卷三,第65页。

[2][4]郑观应:《弭兵》,《郑观应集》上册,第924页,第925页。

[3]王韬:《英但自守》,《弢园文录外编》卷三,第66页。